

批评与立场

汤奇云 著

- ◎ “酷评家”，批评界的谬种？
- ◎ 质疑民间立场——向陈思和先生请教
- ◎ 问题的沉重与怨恨的比较——关于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阅读札记
- ◎ 关于浪漫主义中的反科学主义的几点质疑——向俞兆平先生求教

广州出版社

批评与立场

汤奇云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与立场/汤奇云著. -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731-668-8

I. 批... II. 汤... III. 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209 号

书 名	批评与立场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广建大厦 9-10 楼 邮编:510635)
印 刷	梅县印刷厂有限公司 (地址:梅州市东郊岗子上 邮编:514011)
规 格	148mm × 21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31-668-8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序：立文以诚

“精诚动人”，这是中国的古训了，但是这“诚”字在如今文论中却越来越难以感受到了。尽管写文章的越来越多，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高深与新颖，甚至写文章的人的学历学位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是博士硕士就是博士后；但是可看的、令人感动和回味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少了。因此，这更说明了“诚”字是立文的根本，因为它显示的是作者自我的灵魂及其状态和质量，更是与读者真心相约、倾心交流的基础。没有“诚”字，就意味着没有灵魂，没有作者自我，进而就有可能虚张声势，借势炒作，在某种程度上“造假”、“行骗”。就从这一点来说，如果缺失了“诚”字，也就意味着整个教育体系、人文精神、继而是整个人文学术研究基础的崩溃，而一些所谓“高层次、高学位、高水平”的研究就只能流于表面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甚至强化了其虚伪性、不真实性和欺骗性，最终导致人们信仰、信誉和信任的危机。

也许这也正是我对汤奇云的做人与立文感受最深的地方。作为汤奇云的老师和朋友，我们曾经有三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起读书、散步的日子。我虽然没有资格对他的思想文字，以及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做出总体评价，甚至，对他其中一些观点和论述，我也不能完全把握和理解；但是我却每每为他做人为文的真诚所打动，也因此非常欣赏他。因为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做文章，都发自内心，都来自于他自己对于生活、对于作品的真切感受；而且他并不顾及这种想法、这种文章可能会带来对生活、工作的影响——这在上世纪90年代深不可测的上海文坛确实是“不聪明”的。就因为这种情景，我在欣赏他的同时也会隐隐为他担心，好在汤奇云志在四方，并不计较老师在这方面的无能无为，离开上海去了深圳，不仅依然保持着原本的那颗真诚的心，而且结交了很多良师益

友，获得了能够继续独立思考、立文以诚、自由创新的空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汤奇云的文章无懈可击。汤奇云是一个重性情的人，为文当然顾忌少一些，感性色彩浓一些，由此使文字多了一些生命感，少了很多“苦心经营”的痕迹；但是也会因此容易流于浮泛和随意性。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一些问题他自己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二是有关知识还不够充实，还不足以想明白、说清楚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还需要勤读书、多读书，多方面吸取知识，充实自己。不过，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要汤奇云从此就谨小慎微，去苦心经营什么；相反，我倒是希望他能尽可能继续保持立文以诚、自由创新的情怀，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忘多读书，同时以天下人为师，多与他人交流，向他人请教。

此为序，与奇云共勉。

殷国明

于上海华东师大一村210室402室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日

目 录

序：立文以诚（殷国明）

一 90年代文坛症候诊断	001
文坛“狂吠症”：“骂人批评”的滥觞	003
批评的缺席：90年代文坛状况	010
“酷评家”，批评界的谬种？	020
弃俗媚雅：再看朔爷的“开骂”	025
“两余”之战，并非无关文学	029
文坛“色情症”：从《废都》之“废”说起	033
“道德”国里文学的性“过敏症”与“痴迷症”	039
到底是淫荡的“婊子”还是欲望的“宝贝”？	046
聪明与脆弱的话语策略	051
三种性“痴迷症”患者	056
二 学术意图伦理批判	061
价值的模糊与理论的贫乏	
——人文精神寻思者最缺少些什么？	063
质疑“民间立场”	
——向陈思和先生请教	067
文学研究的立场何在？	075
以知识的立场领会鲁迅	
——关于徐麟《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的阅读札记	083
如何辨识真知？	088
问题的沉重与怨恨的比较	
——关于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阅读札记	093
纵论中国文学观念中的“雅俗”之辨	
——关于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的阅读札记	098
“心灯”为谁而亮？	
——重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115

关于浪漫主义中的反科学主义的几点质疑	
——向俞兆平先生求教·····	150
浪漫主义研究中的意图伦理现象批判	
——与俞兆平先生再商榷·····	155
附：思辨逻辑与史实语境	
——兼答汤奇云先生（俞兆平）·····	170
三 艺文阅读与印象评点 ·····	181
2001 年文化现象八评·····	183
长刺的山楂树篱	
——又到评奖时·····	193
反腐文学的三个缺陷·····	195
笑看风云淡 平心论人真	
——观金大侠重改经典·····	197
对余华两个论断的怀疑·····	199
少栽刺，多种花！	
——也谈如何看待“70 年代作家”·····	201
走出文学的“自恋”时代·····	204
“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熟了吗？·····	205
美学的偏见：歧视通俗文学·····	209
“爆破音”：文学的期待	
——看南翔《当代文学创作新论》·····	213
叩问人文的文学	
——评南翔《今夜无人入睡》·····	216
掘一条民间精神隧道	
——关于南翔小说集《前尘》·····	219
失声的心灵重现	
——读晓风、晓山、晓谷《我的父亲胡风》·····	221
立足中国现实的解读	
——读曾仕强《解读中国人》·····	223
在诗性的指引下	
——评深圳五位“广东新人新作”获奖作品·····	225
去，找那看得见的幸福	
——读谢宏《文身师》·····	230

怀念雨果的文学勇气	
——雨果 200 年祭·····	233
20 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之死	
——怀念孙犁·····	235
遥想雪莲花	
——怀念我的文学导师·····	237
寄怀秋水 坐沐春风	
——钱谷融先生印象·····	240
学者的虔诚·····	243
生命写作的代价	
——从夏中义的脑门飘雪说起·····	245
“失眠”的南国诗心	
——读李士非的诗·····	252
“红杏出墙”式的写作·····	256
众声喧哗与鼻子写作·····	259
奥斯卡：一场驱赶无聊的游戏·····	261
年画：神圣的与世俗的·····	263
人体：艺术与道德的抗争·····	265
DV 指引的世界·····	267
还想从王教授这里得到什么？·····	269
来点适度的自我检讨·····	272
看当下的逻辑文化·····	274
教师，真的需要用“节日”来拯救？·····	277
审美与立场	
——评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	279
权谋，凭什么文化？	
——权谋文化制造者批判·····	283
理发师与文化水土保持	
——刘中国《凌道扬传稿》序·····	292

后记

—
90年代文坛症候诊断



文坛“狂吠症”：“骂人批评”的滥觞

蓝棣之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所采用的“症候式”分析方法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医生的姿态，一般来说是一种健康的姿态，是为了治病救人，除非他是庸医，或者是怀着不可告人目的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医生。

如果给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坛号号脉，看看文学家们和批评家们肿大的舌头与充血的眼睛，就知道他们神情浮躁，肝火太旺，动辄“批判”、“开骂”、“棒喝”，与人叫阵，或舌头底下含沙射影。有的则干脆自命为“狗”，一只“见谁灭谁”的狗，明确摆出一派“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式。文坛倒是摆脱了“失语症”，但满耳充斥的是一片骂声与“狗”儿们的“吠声”。以蓝棣之先生的“症候”分析法来看，当今的文坛是患上了“狂吠症”。

其实，狗儿们吠几声并没有什么不好，倒是能显出几分人间生气；骂人也并不可怕，骂人式的批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骂”得在理，“骂”得有据。而且凭心说，当今有的人或有些现象，确实非“骂”无以触动其顽劣的神经，非“骂”无以平民愤，非“骂”无以释心中的怨气。鲁迅的文字，就曾经被视为“骂人文学”。

况且，做“狗”也不一定是什么耻辱，只要这条狗不是一条趋炎附势的“走狗”。郭沫若就曾经自喻是一条“天狗”，它就不是简单的要“吠”几声，而是要把月儿吞了，把太阳吞了。“狂”一点也不打紧，鲁迅就历来反对“费厄泼赖”，要求在中国文化中注入一点“偏至”，还塑造了一个“狂人”形象，来启蒙民众。鲁迅虽然也讨厌狗，但他反对的只是“叭儿狗”。

因此，“骂人”批评是一种张扬个性的批评，但它必须以学理与良知为支撑。

90年代后期的王朔，总以其富于性情的批评文字在文坛摆着各种“骂人”的靓丽造型，从而获得各种传媒的青睐。人们就像坐在T形展台的两旁，总在翘首期待着这位“明星”下一回又穿什么“服装”，摆什么“姿势”。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是这个王朔，几年前还是一个遭人“痛骂”的文坛“痞子”呢！而此时，正是这个“痞子”还引发了一场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并触发了“二王之战”。

我们不得不承认，王朔是上世纪末文坛引领风骚的人物，不管你认不认可这种“风骚”。

当80年代末的“寻根小说”和90年代初的“先锋小说”日渐式微而步入困境时，王朔的“另类”小说（如《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顽主》、《我是你爸爸》）却大大的“火”了起来。这把“火”不仅烧毁了整个文坛稳定的美学秩序，还“烧”到了影视界。他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爱你没商量》、《渴望》等影视作品的“红火”，使文学的“轰动效应”得到了延续。

王朔这一文坛“嬉皮士”的出现，马上遭到了富于责任感的严肃文学界的排拒。上海文学界最早敏感到他对旧有文学秩序的冲击，特别是对文学中的审美价值秩序的冲击。他们认为王朔的“调侃”、“玩”文不恭的姿态，是时代人文精神日见萎缩的症状，体现出一种世纪末的颓废与无奈，是一种精神立足点的向后退却，最后总结为“人文精神的失落”。王朔遭到了文坛“绅士、淑女”们（王蒙语）嗤之以鼻的厄命，甚至还“连累”了影坛红人张艺谋，他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也被认为是一场“游戏”，走的是文化回归之路。

历来以敢于“前卫”、敢于探索著称的王蒙，则认为王朔的“调侃”是在“躲避崇高”。其实王蒙并不是反对“崇高”，而是对人文知识分子倡导的对所谓“终极价值”的追求表示出一种怀疑，认为有可能是又一次“装腔作势”、“高度大话”、“危言耸听”，因

此完全认同、赞赏王朔的这种文学姿态，正式和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们拉开了架势。

应该说，这场争论还不是关于要不要“人文精神”或“终极关怀”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于到底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体系的价值冲突，是知识界的一场价值观念之争。

王蒙从他自身的人生体验（包括政治生涯）出发，认为人文精神不是空洞的“终极关怀”，也不是以往的那种透露出森严道德杀伤力的人生理想，更不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原则”。他认为，中国人还没资格谈论这些，人文精神的建设应该从“宽容”的人道主义做起。中国人不是缺乏“理想”，更不是缺乏“原则”，而是缺乏宽容。正因为缺乏宽容，文革中才有那么多的“血泪账”、“阶级仇”。既然要提倡“宽容”，当然包括对王朔也应该宽容。

这本是知识界“学院派”和“经验派”之间的认识分歧，是知识界正常的学术争鸣。只是这场争鸣根源于价值层面的分歧，而大大降低了它的学术意义。

我们过去知识界的大多数争论都是围绕着什么好、什么不好来进行的。这种价值判断永远是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和意趣都不同，因此就只好根据各自的利益和意志来说话，而且最终都要挂上为人民大众、顺应历史潮流等崇高的招牌。

学术领域里，虽然价值判断总是要做，但应该说，它还不是根本的学术探索方向，主要的探索方向应该还是是非问题和真假问题。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往往就是一种表层的价值冲突，而忽略了潜藏着的深层的真假认识冲突。价值冲突的肤浅性表现在，事物的价值虽然不会改变，但价值评价总是随着评判者的利益或意趣而不住地发生改变。既然价值观可以发生改变，自然就可以调整，价值冲突也就可以通过调整而消失，因此价值观上的分歧并不是人们根本性的学术分歧。况且，有些价值观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见，固守它也未必会是一种好事，接受他人的价值观也就不一定是件坏事。因此我们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还只是停留在一种浅层次的争论上。

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浅层次的争论并没有维持多久，便沦落到了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和庸俗的人格辱骂。“黑驹”王彬彬的闯入就是这场转变的转折点。

王彬彬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不仅“骂”了萧乾在文革中缺乏硬汉的刚性，也讥讽了王蒙的“油滑”和“聪明”，实则是责备王蒙有些世故。王蒙在著名的《躲避崇高》一文中说王朔“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王彬彬则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说“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以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都是二者共有的。王蒙成为王朔的知音，的确并非偶然”。

实事求是来说，王彬彬说王蒙世故、“聪明”，并不是根据王蒙整个人生历程来说话的，而是仅仅从王蒙评王朔的这一句话来进行批评的，不免失之公正而走向偏狭，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格诬陷，至少也是有失学术的严谨。从后来看，假如王蒙真像王彬彬所说的那样为人“聪明”而世故，他就不会为这一句刺耳的话而大光其火，进而大骂王彬彬是“黑驹”，比“黑马”还等而下之，是想通过往名人脸上吐吐沫而出名。

其实王蒙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幼稚，确实也应该要“聪明”一点。难道别人说你一句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了吗？历史当然是任人评说，也决不是任人胡说，还是要相信社会大众的良知，相信历史的公正性。人格的定位和评价，关键还在于你如何做，而不在于你如何说。

王蒙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那篇反击文章《黑马与黑驹》，实在也不是一篇很高明的文字。他说：

最近该青年乃改弦更张，改写“骂派”文字，专骂名家大家，骂他们的作品并非篇篇是纪念碑与史诗，骂散文的兴旺，骂女作家

琐屑而且乱开玩笑，骂晚报的文体，骂文章题目里动不动是“我的……”骂中国作家太聪明，没有政治运动中壮烈牺牲，骂评论家没有像他一样地骂……三骂两骂，“该同志”立即看好起来，“有噱头”哉！——在大街上如果有个人骂架，也会围拢一圈又一圈人观看的，这也是中国国情之一种。于是约稿也来了，姓名的出镜率也高了，稿费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了；时来运转，行市看涨，过去羡慕妒嫉的频频有新作发表的作家名流，过去也是够也够不着拉也拉不下来只能恨得牙痒的文坛娇子娇女，却原来根本不在话下！只消高高地拉开架势一骂，轻而易举地就与之同领风骚了乃至彩声四起了。真妙啊！多么快捷的途径，多么犯贱的文坛！骂而优则文，骂而狠则名，驾吐沫而升九天，乘恶言而游四野，各种效益丰收，俨然又一小黑马——应该算是黑驹——应运而生矣！

……

您骂了半天给我们做出了什么榜样来呢？干脆大家一起骂好不好？再说您第一骂为刺激为一鸣惊人，再骂为重复为自我循环，三骂为絮叨为气迷心窍，四骂就只能令人觉得乏味与讨厌了。所以，黑马云云，其轰动效应仍然是极其有限的。

短短的一两千字的文章，“骂”字达二三十个之多。我这里抄录的还只是其中“骂”字最集中的两段。当然，这里的“骂”是王蒙对王彬彬批评姿态的一种十分睥睨的描述，但是“骂”字的这种加强型的密集使用，并不能真正让人信服王蒙所指涉的结论——王彬彬是一个“骂派”批评家，就像“文革”中我们所常唱的那首“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歌，只能给人一种强词夺理的偏执狂印象。也并不是“骂”字就不能用，并非“卑劣”的人格与动机（不管他有没有）不能骂，而是文章中的情绪化、意气化等非理性成分，使得这篇文字离他所厌恶的“骂派”文字并无二致，离泼妇骂街也并不远。使我们犯糊涂的是，王蒙到底是真心厌恶这样的文字还是欣赏这样的文字？

而且，王蒙率性而尽兴的这篇“骂派”文字，还附泥附水地“打”到了其他的“文学青年”身上，以及一些真正想为知识界作出贡献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上。说他们是想借骂名人而出名；是为“高喊孤独而抢话筒”；是“伪崇高”。应该说，从这篇文字来看，王蒙是有着名人的优越感的。而这种名人优越感既扭曲了王蒙的自身形象，也伤了一大批“文学青年”的自尊心。是呀，如果你王蒙十分在意、恼怒“文学青年”的这种“骂”，难道你就只能容忍来自其他“名人”的骂吗？当今世界难道只有名人骂未出名的“文学青年”的份吗？名人的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吗？“文学青年”刺耳的批评文字都是为出名的“骂派”文字吗？你王蒙不是提倡“宽容”吗？你既然能宽容王朔的“乱砍乱抡”，为什么就不能宽容“文学青年”的乱骂乱评呢？

更主要的是，两篇都是缺乏学术严谨性的意气文章，却把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严肃的学术讨论搅和得乌烟瘴气，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最后不了了之。王蒙的这篇关于“黑驹”的文字一出场，就把这场“争鸣”的“阵线”划分得一清二楚，被王蒙推向对立面的有老老少少两种人，老的是在搞道貌岸然的“假崇高”；少的是为了出名的乱骂。阵线倒是明确了，但主题却全变了，变成了责问人们提倡人文精神的私人动机了。就好像在房地产建设中，房子还没建成，合作的双方就在相互谴责对方缺乏诚意甚至胸怀叵测，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最后，王蒙倒是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而舒坦了很多，王彬彬也真正由“竖子”而成了名，可我们的思想界、批评界获得了什么？我们只能无奈地说多了一种批评方式，那便是真正泼口水般的“骂派”批评。批评在真正地走向堕落！

王蒙自文化部长退位以后，也从“庙堂”回到了“广场”或“民间”，说话也从十分注意形象的四平八稳到了偶露峥嵘。说来也奇怪，王蒙面对“获奖专业户”、同样大红大紫的电影大师、同样遭到了人文精神倡导者批评的张艺谋，却无法宽容，而大批其“伪

风俗”。说张大师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所表现的“挂灯”、“驾幸”、“捶脚”等增进性欲的情节，全都可能是在外国硬通货的吸引下的对西方文化的追逐，是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的杜撰，是编剧幼稚可笑地对将来可能翻译成外文的前景满怀憧憬，而投合西方读者胃口的产物。

张艺谋或者极力仿效张艺谋的一类作家是否拿到了外国硬通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老谋子在艺术上的成功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的电影不仅洋鼻子的老外喜欢，国人也表现出少有的厚爱。在张艺谋身上，有着当下中国人所难得拥有的艺术个性与艺术思想，且不论其思想有多少合理性和创新成分。

其实，张艺谋成功最大的秘密在于，他总能把时俗所尚，以《红高粱》中抬轿的方式把它“颠”到极至，因此他总是能比人更洒脱，也更时尚。前期的电影能够大红大绿，色彩浓艳到使你觉得有“假”；后期则能够朴素到使你觉得有“伪”，但张艺谋的艺术个性却在这种自在而真实的张扬中，使一贯持中庸厚道态度的中国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味。外国人倒不一定相信电影中夸张的事实，但他们却从张艺谋身上看到了中国人其实也有渴望张扬的欲望。

因此，国人大可不必担心老谋子在国际上出老祖宗的“洋相”，丢乖卖丑。即使老谋子卖的是“伪风俗”，受骗上当的是老外，气愤的也应该是老外，王蒙先生大可不必出来打假。

由此我们得出一点教训，批评不必去遵循大家都认可的一定之规，但必须尊重自身的意趣。但仅仅从自身的意趣出发也不行，“二王”的批评就都是从自身的意趣或者说是意气出发的，还得遵循一定的学理，尊重常识性的事实与经验。专注于其中的某一点而不及其余，都只能使批评走向空谈，或演化为一种意气之争。正如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辞》中所言：“绝没有权势，只有些许知识，些许智慧和尽可能多一点的趣味。”当然，罗兰·巴特谈的是他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但我们认为，也绝对适用于我们当今批评家的精神状况。